

摘取桂冠的人

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小传

编 者

〔美〕威廉·布赖特

罗杰·W. 斯潘塞

译 者

(按姓氏笔画)

柳 青 赵 拓

校 者

司徒·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沈阳

Lives of the Laureates
Seven Nobel Economists

edited by
William Breit and Roger W. Spencer

本书根据美国The MIT Press
出版社1986年版本译出。译本版权
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代为申
请,并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允许。

摘取桂冠的人
——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小传
Zhaiqu Guiguan de Ren.
柳青赵拓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110,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4 $\frac{7}{8}$ 插页:4
印数:1—10,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程国范	责任校对:高庆
特邀编辑:沈秀英	版式设计:王珏菲
封面设计:李国盛	

ISBN 7-205-00775-5/I·62

定价:6.60元

前 言

本书包括了七位著名学者的自传体裁文章。这些学者均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他们都是经济学家；（二）他们都曾荣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三）他们都曾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特里尼蒂大学讲过自己的一生经历。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不是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生前创立的。一九〇一年，他的遗嘱要求设立物理学奖金、化学奖金、医学（或生理学）奖金、文学奖金与和平奖金。他希望这些奖金授予获得者所取得的特殊成就，能比奖励获得者本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关奖金则应分别颁发给对自然科学的某一学科有过特殊“发明”、特殊“发现”或特殊“改进”的科学家。一九六八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它成立三百周年创立了一种新奖金，这种奖金被命名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它仍参照以前五种奖金的标准颁发。瑞典中央银行为此规定的标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应遵循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每年发给对经济科学作出特殊贡献的人。”

罗杰·斯潘塞首先想要举办一次系列讲座，让各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现身说法，讲自己一生经历。斯潘塞在学术生涯中曾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去研究和讲授当代各位一流经济学家的学术生活和经济思想，并就这些问题撰写了许多论著。他始终注意经济学家自身经历与其创造过程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导致他产生了上述“提供一个讲座”的想法：在这个讲座中，让各位经济学家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就“我如何成为经济学家”这个总题目畅谈个人的回忆录。这样的讲座至少可以把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特殊性质的大量文献资料保存下来一部分。然而，举办这次系列讲座的主要目的，却在于为科学发现理论提供第一手重要材料。

人们迄今罕知各著名经济学家的原始思想产生过程以及他们的崇高地位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承认的过程。社会科学论著对其创作者的生活究竟能反映到什么程度？有影响的师友们对他们的作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个人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产生了多大影响？什么主要力量推动他们去深入研究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获得了经济学界所重视的成就？这次系列讲座将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究竟邀请谁参加呢？由于我们经费有限，筹备时间短促，只能选请少数学者参加。我们进行选择的标准如下：

（一）只邀请那些于颁发诺贝尔奖金时正在大学担任教学或研究任务的经济学家；（二）尽可能地包括方方面面（不同学术贡献、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分析方法和不同思想观点）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一九八三年，经过初步审议，有十二位诺贝尔奖

金获得者（其中有一位因病不能远行）符合第一条标准。再按照第二条标准进一步认真筛选，把正式邀请人数最终压缩到八位。使我们又惊又喜的是：在被正式邀请的这八位经济学家中间，只有一位因故不能参加。

这七位著名学者大都面临着一项困难任务。要知道，一般学者都不愿在公开场合大讲自身的学术贡献。有一位应邀参加的经济学家说得好：“要讲得真正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不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谈何容易啊！我怕做不到这一点。”何况，他们的论著大都充斥着专业术语和计算公式，未曾学过经济学的人通常很难懂得。例如，萨缪尔森和阿罗的学术贡献主要在数理经济学方面，克莱因、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和托宾则经常使用着统计技术和计量经济模式。这一切都用他们自己的专业用语表达出来。然而，我们却要求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自己的贡献，使一般听众都能理解。这当然更加重了他们的困难。

不过，这次系列讲座的听众（或本书的读者）最终将会发现，各位讲演者都尽量设法深入浅出地讲了自己贡献的性质和意义。（本书各篇文章均按讲演者在特里尼蒂大学系列讲座中发言的顺序排列）。很难想象有什么途径能比倾听（或阅读）肯尼思·阿罗用自己的语言所进行的讲述更容易掌握他的“不可能定理”的实质了？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劳伦斯·克莱因自己的讲话更清楚地表达他的那些“计量经济模式”的概念了。乔治·施蒂格勒对“信息理论”的自我说明，循序渐进，条理清晰，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听众（或读者）都能明白。这次系列讲座的每位讲演者的确都在尽可能地保存很难消化的专业内容的前提下实现了通俗易懂的目的。

这七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特里尼蒂大学的这次访问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他们的讲演场场爆满，听众表示十分满意。好多听众还专程长途跋涉而来。每位经济学家都在非正式场合会见了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不论在小型欢迎会上，在饭店的餐桌旁，在教师休息室喝咖啡或在私人住宅举行家宴时，广大师生都能跟二十世纪最受尊敬的这些经济学家自由在地、毫无拘束地进行交谈。尽管他们都是名望很大的学者，其中还有些人个性也许很强，但给接触过他们的人几乎都下了“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深刻印象。人们从这次系列讲座中得到的一个意外收获是：认识到现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毕竟还是“普通人”。

这次系列讲座使广大听众从现代经济学的主流中看到了许多支流。读者将会发现各条道路往往意想不到地纵横交叉；观点截然不同的思想家往往受到同一位老师的教诲；运气以及毅力和努力在科学家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往往都起着重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从这些自传体裁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著者埋藏在文章深处的真正心理状态。这一点，某些感觉特别敏锐的读者也许很快就能察觉出来。总之，美国这些一流经济学家的自传体文章，已经为五花八门、丰富多采、深奥渊博的当代美国经济思想描绘出了一幅袖珍图画。

目 录

前 言

I	W. 阿瑟·刘易斯	(1)
II	劳伦斯·R. 克莱因	(21)
III	肯尼思·J. 阿罗	(43)
IV	保罗·A. 萨缪尔森	(59)
V	米尔顿·弗里德曼	(83)
VI	乔治·J. 施蒂格勒	(101)
VII	詹姆斯·托宾	(121)

W. 阿瑟·刘易斯



我从来就没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父亲曾想让我当一个律师，但他去世时我才七岁，他没有适当的时机发表意见。这个机会的来临是在一九三二年，当时我被授予圣卢西亚政府奖学金，这笔奖学金在任何一所英国大学都有效。我也不想当医生，更不想当教师。这使我陷于困境，因为做律师、行医、布道和教书是那个年代年轻黑人所能从事的仅有的几种职业。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但不管是殖民当局还是甘蔗种植园，都不会雇用一名黑人工程师。怎么办呢？我的母亲支持我所作的任何选择，没有她，我绝不会取得如今的成就。正当我翻阅伦敦大学简介时，我被一个所谓“商学士”的学位吸引住了，取得这个学位所需学习的课程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法、企业管理、经济学、经济史和一门外语。这门“经济学”是什么课程？我从未听人说过，圣卢西亚的人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虽然我搞的样本很小，没有什么代表性，但这无关宏旨，因为其余课程都很实用，将为我以后在企事业单位寻找职业奠定基础。于是，我选定了它，在一九三三年去伦敦攻读商学士学位。

位。那时我才十八岁。

我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崭露头角，所以，当我一九三七年毕业考试独占鳌头时，该学院给我一笔奖学金，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二年，我担任了一年助教职务，一年后又成为一名助理讲师。许多年来，我总在为自己怎样谋生而忧心忡忡，希望有朝一日能心情舒畅地回答亲友们对此提出的问题。直到那时候，这一切都可以忘掉了，因为我将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我进大学之前虽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对经营管理却有一定的认识。我一九二九年就已离开中学，在这之后的四年内一直在政府部门当小办事员。在此期间，我学会了职员应掌握的技能——打字、记录、写信，以及进行文件归档。这些技能对我这个大学生很有帮助。我在工作期间也熟悉了管理和法律方面的某些知识，这些知识也不无用处。

当然，我也挣了一些钱（月薪三英磅）贴补家用。在当家理财方面，我母亲可说是无与伦比的能人，加上舐犊情深，使她能够把守寡时还很年幼的五个儿子全都抚养成人。（我排行第四）。我母亲的一生是有成就者身世的典范。她是携带五个孩子的寡妇，依靠菲薄的收入养活全家；她（以及我父亲）是来自安提瓜岛的移民，人品高尚正直，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对上帝无限崇信。当我还是一个上学的孩子时，一听到其他男孩子谈论男人比女人如何如何优越，总认为他们在说疯话。

我离开了学校，因为我已经学完了获得剑桥中学教育检定证书所需的所有课程，这相当于通过了（美国）大学入学学术能力测验。我十四岁完成了这段学业，因为我六岁时曾因病休学三个月。从前当过教师但当时是海关官员的父亲对我说：“别着急，我每天教你一点，这样你就不会被拉下了。”他

的话其实估计不足。每天接受单独辅导的聪明孩子在三个月内学到的东西也能与他在学校课堂上二年所学的东西相差无几。当我返回学校时，我连跳两级，而且各门课程的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这是一段给我留下了心理创伤的经历。这意味着在我剩余的学校生活中，我总得和比我大二、三岁的孩子在一起。他们炫耀他们的肌肉，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弄。打板球时，他们总是正式队员，而我却是候补队员。由于体质较差，我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我发现跻身于这群人中间，不仅要功课学好，而且还必须符合他们和自身的标准。假如我一直在那个学校呆下去的话，我不会成熟得如此之快。我去英国时曾担心英国十八岁的青年们的自理能力会比我强得多，后来发现他们并非如此。

命运注定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而且决定了我将要当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这不仅意味着我应把经济学应用来解决工业或其他部门的结构问题。它说明我应从体制背景入手来研究问题，应该意识到问题的答案不仅可能通过经济分析求得，同样也可能存在于体制环境之中。

同时，我将研究的哪门应用经济学也确定了下来，因为我被指派担任商业经济系教授阿诺德·普兰特爵士（Sir Arnold Plant）的助理讲师。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刻为我说话，我既不会得到奖学金，也无望获得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院首次聘任黑人教师，而且几乎没有遭到阻力）。他与我存在着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因为他是一个放任主义经济学家，而我不是，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因为普兰特教授是研究英国工业组织的专家，所以他让我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并建议我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就这样，我也成了一名研究英国工业组织问题的“专家”。我喜欢

4 摘取桂冠的人

这门学科，从而也就不认为是件苦差事了。

三十年代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与其他时期一样）是一个学术气氛非常活跃的地方。教师们代表的观点各种各样，当二、三门相同的课程都在竞相讨论一个“热门”主题时，那些听课学生将会得到奇妙的享受。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典型优秀学生是聪明的，因为他要努力掌握许多互相矛盾的观点，同时又是多疑的，因为他要学会不断地划清谬误与真理的界限。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不以培养杰出的国会议员载誉英国，而以培养卓越的企业经理闻名世界。

该学院当时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兴趣还不太大，只有一些年轻的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讲授，那些名教授则都加以诋毁。另一方面，该学院当时正在世界范围内领先发展新经典派经济学，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罗依·艾伦（Roy Allen）、尼古拉·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弗雷德里希·海克（Friedrich Hayek），以及里昂诺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

这正是我开展工作的适宜领域。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文章都旨在完善这个理论：把文字变成图表，再把图表变成方程。我是以事实检验理论的少数人之一。

我从一九三七年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后开始研究工业组织问题，一直搞到一九四八年去曼彻斯特出版了《间接制造成本》一书为止。该书实际上是我那篇博士论文的修订本。

我对间接制造成本的兴趣，是研究单位平均成本超过边际成本情况下的价格结构。帕里托定律（the pareto rule）认为价格应与边际成本相等，可是应用这条定律却会导致企业破产。在实践中，这一情况介于破产和垄断之间，正像今天民航

工业的情形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以边际成本定价，企业如果亏损则给予贴补，但这种补贴以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二者的差额为度。这作为一项广泛应用于各个工业企业的政策，很难说切合实际，而且也不能说合乎情理，因为这种办法将会迫使许多纳税人去为他们根本没享用到的服务付钱。如果按照谁受益谁掏钱的前提入手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就归结为：这些固定成本如何在各使用者之间进行分摊。我在这里从铁路上“按运输负荷量收费”的原则出发，并联系了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新近详尽阐述的价格差别理论。

间接制造成本的另一个问题是时间因素。需求起伏波动，并不稳定。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贮存，那么，生产设备就会出现正常的或非正常的闲置时间。这种成本将怎样分摊呢？我论证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即在不同时期不同产品的共同成本中，把固定投资作为一个生产者，分别负担其应付的费用，在不超过总成本的情况下，支付应付的金额。

所以，我的主要论点是根据间接制造成本的这些研究方法去考查各工业企业制定单位产品价格以外的其他各种价格体系，如双重价格、每日定价、数量折扣、信誉折扣以及商品券和搭配购买等体系。同时，我的兴趣也涉及到了与定价有关的法律史的研究。以后二十年随着英国价格法规的普及，我的这部著作自然受到读者的青睐。

我对工业结构的分析研究，为业余著述打下了基础。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经济计划原理》，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到今年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该社是英国工党的智囊团，尽管它实际上比工党的历史还悠

久，而且是独立于工党的组织。一九四七年我出席了该组织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我因为宣读了一篇关于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与消除通货膨胀后果的必要措施的论文而遭到了围攻。我当时对该社有些成员为此大动肝火而感到震惊，我对该社负责人说：“你真应该委派专人去研究一下这些问题以及管理一个混合经济体制所面临的潜在危险。”他回答说：“那好，你去干吧。”我稍作考虑后，把任务接了下来。

费边社的出版物通常只有二、三十页，但这次出版的小册子竟长达一百余页。这倒不是因为我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要细致地论述如何管理一个混合经济体制，至少也得那么多篇幅。这本书并无独到见解，但问世得很及时。虽然它只探讨英国一九四八年面临的问题，但仍被翻译成好几种文字，并畅销于世界各国。该书提出的避免通货膨胀的方法带有凯恩斯理论的色彩，反对可以把货币收入的年增长率保持在不超过百分之三的水平上。我最近为了准备这次演讲而重看了这本书，觉得其中只有一点需要重新考虑研究。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在社会经济连遭挫折后上台搞混合经济体制，经常会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碰壁而不得不改变政策（例如，法国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八一年；英国在一九四五年；牙买加在一九七六年）。应该有人动笔去写一种可以取名为像《头两年》那样的专著，探讨一个新的社会民主政府在实施它的计划时所要着手解决的混合经济体制问题。但这要让别人去写了。

现在让我回到本题上来吧。我想这个系列讲座的主办人希望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何与他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坦率讲，我不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典型。我一开始就告诉过大家，我本想当工程师，结果却成了一名经济学家；我当上大学教师

是因为找不到其他适当职业；主讲教师的专业是应用经济学，又使我也成为一名应用经济学家。我的下半辈子究竟将干什么，自己也不能明确说出。我不是在这里抱怨，命运之神对我要比对其他大多数人仁慈一些。我只是把自己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

一九四五年，我放弃了工业经济学，而去讲授另一门不由我自己选择的课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概况”。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一九四五年担任经济系代理主任的弗雷德里希·海克有一天对我说：“我们向学生灌输的是商业循环理论和大萧条的来龙去脉，可是新生都出生于一九二七年，记不得大萧条，根本不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你能开一门介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经济情况的课程吗？”我说：“对您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那就是我自己对这个期间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海克说：“学习一门学科的最好方法是去直接讲授它。”就这样我得以在四年后出版一本名为《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的经济概况》的小册子，综述了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已经了解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的世界经济大概情况。

今天，人们可能把该书看作是计量经济学家的一部著作，但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在经济学界树立起像今天这样的重要地位。廷伯根（Tinbergen）曾利用他的战前英国经济模式提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但只是指明了一般方向。同时，关于二十年代的统计数字极少，反映三十年代情况的数字也多不了几个。我曾试图多看些那时的经济学论著，尤其是金融周报，以期找到一些线索，但收获甚微。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也不一样了。现代经济学家论著的字里行间充斥着百分比和上十亿的数字，即使在每天的报纸上也是如此，连外行的读者也想

在头脑中安上一台计算机，以便换算各项数据。战前经济学家们则往往用诸如“许多”“几个”或“一些”等笼统的字眼，来避免使用数字。

回顾一下，我觉得自己对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见解要比对二十年代所谓“经济繁荣”的见解略胜一筹。美国人一般认为美国经济二十年代后半期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繁荣，但统计资料不能证明这一点，只表明情况一般而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误解，使他们误认为二十年代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繁荣时期，从而低估了世界贸易相对停滞及其严重后果。主要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钢铁、船舶及煤炭等供给过剩，造成了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工业中心城市出现大批失业人员。那时，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不适当的汇率；我们则称此为结构性失业，寻求更积极的解决办法。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会 lead 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又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对这些问题，我在书中既未提及，也没有做出解答。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世界经济形势二十年代后半期比五十年代前半期更不稳定。

奇怪的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为什么较易理解。首先要避免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萧条？许多商业循环理论提出了不少有关大萧条原因的解释，每种解释似乎都有充分论据，虽然有些解释未免离题太远。如果任其继续下去，人们势必陷入纷乱的论争之中。

我提出的解释是：工业萧条在上个世纪中每隔四至十年就出现一次，问题不在于一九二九年为什么会出现一次萧条，而在于这次萧条一旦开始，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那么，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谁也没有本领只用较

小的篇幅就能说明这次大萧条的来龙去脉，但可以列出一些在这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有下列七个：

①这次美国经济繁荣是与“铁路建设—移民—建房”这一循环同步发生的。国会早在一九二四年就限制移民入境，二十年代后半期的建筑热已降温，三十年代前半期出现的那种异常的经济疲软大大地削弱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②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国内外的农产品价格持续跌落，供给能力的增长超过了需求。农业地区消费水平低下，美国农村地区的许多银行纷纷倒闭。

③金融机构和财政当局认为推动生产复苏的最佳办法是减少居民货币收入流量，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这也可能使大萧条进一步恶化。

④德国的工业衰退与美国同样严重。双方的经济疲软对对方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⑤各地的资本家都失去了信心，减少了他们的投资量。这种情况不断加剧，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下降、收入降低、生产能力过剩以及投资更少，等等。

⑥二十年代后半期，凭自我吹嘘而博得公众无限信任的纽约股票交易所也不再唱高调了，这反映出各地普遍发生的不良景气。

⑦世界各国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外汇管制，提高关税税率。国际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上列清单反映不出这些因素所起的相列重要性、它们的先后顺序及其相互关系（这一切都是计量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问题。）该清单只是适应我眼前的需要，它足以证明一九二九年发生大萧条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候许许多多不利因素都汇集到

一起了。

该书虽已出版问世，但我头脑中仍有两个问题未得到答案，这两个问题以后要花费我学术生涯中的一大部分时间去进行研究。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这是该书的核心问题，因为农产品价格的疲软一九二五年以后逐渐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使得农民破产，银行倒闭，迫使各国放弃金本位制。而且，这个问题也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国也深受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之苦，挫败了联邦政府稳定国民经济的种种尝试。

我后来研究贸易条件时，观察到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二者之间有着一定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世界工业生产每上升百分之一，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总额就增长百分之零点八七左右。这种关系一直可追溯到一八七三年并延续至一九七三年。一八七三年之前的情况则并非如此。我在研究过程中，编辑出版了一八七〇年以来（有些是一八五〇年以来）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世界工业产品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以及热带产品和工业品价格指数等。

从理论上讲，短期内决定贸易条件的因素肯定是需求和供给。你可以按模式去计算一下不同种类商品的短期弹性。我认为（按照我下面的模式）长期内决定热带作物贸易条件的因素是热带产品供给的无限弹性，热带作物的贸易条件因而并不受到需求变化的影响。这种无限弹性的存在是由于农产品出口量仅占热带农产品产量的一小部分——不到百分之二十，而且农产品出口量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比如二十年内）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或缩小。这一成本很低，因为食品作物的产量很少。这个分析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农民若想致富，要多种